

探求马来西亚君主在政治危机中的行事原则与功能

黄婉玮*

中国福建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摘要

本文主要探究君主在政治转型中的角色和功能。2018年至2022年期间，政治精英之权斗导致政权更迭，也形成了国阵、希盟和国盟“三角鼎立”的结构，但没有出现政治暴力和影响社会秩序之事，乃可归于对君主与民主有所规范的联邦宪法。政党和政治精英遵守宪法、尊重担任最高元首的君主仲裁。与此同时，多党竞争演变为精英滥权和极化意识，也正在挑战社会的多元性，国民则将对政治的失落感和忧惧转向了仰赖君主“定海神针”的作用，而本文也进一步反思其中的潜在问题，即精英民主导致基层公民力量弱势，而太过依赖君主制抗衡精英可能导致“权力的天平”倒向君主。

关键词：联邦危机，君主行事原则，君主制作用，反思民主

* 黄婉玮，博士候选人，中国福建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Analysing The Principles And Functions of The Malaysian Monarchy During Periods of Political Crisis

NG Wan W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Xiamen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laysi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monarchy's role, emphasizing the monarch's influence in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Although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from 2018 to 2022 was chaotic, society was relatively orderly, it is reflecting the monarchy's function and role. In other words, while a power struggle among political elites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regime and led to the new structure of Barisan Nasional, Pakatan Harapan, and Perikatan Nasional into confrontation, it did not lead to political violence and social disorder. This result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of the country that regulates the systems of monarchy and democracy. Political parties and elites are willing to follow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and respect the arbitration results of the Malay rulers, who serve as the supreme head of state. Additionally, multi-party competition has led to the elite's abuse of power and the rise of ideological extremism, which challenges society's diverse interests. As a result, people are increasingly shifting their frustrations and concerns about politics toward hoping monarch or Malay rulers act as a stabilizing force to maintain social order and curb extremism. However, this article also pays attention to the fundamental democratic dilemma: that overreliance on the monarchy as a counterweight to elite democracy could lead to an imbalance of power favouring the monarch. That also reflects a political reality of Malaysia: the dominance of elites in establishing democratic rules while grassroots citizen power remains weak.

Keywords: federal crisis, principles of monarchy, political elites, the role of monarchy in political transition of Malaysia, reflection of democracy

一、前言

2018年至2022年，马来西亚经历政党领袖争权夺利而更换了三任首相——马哈迪（第7任）、慕尤丁（第8任）、沙比里（第9任）——四年之间，政府从希盟换到国盟，再换到了国阵。尽管如此，整体没有出现如缅甸与泰国等的军人夺权、独裁及社会暴力事件。这乃引起笔者探求马来西亚国家秩序如何维持的兴趣和动机。

马来西亚近年的政治危机不仅显露政党斗争的事实，也显示出君主如何超越政治立场化解危机，使民主政府得以连续。由于各阶层都普遍地遵守《马来西亚联邦宪法》对君主和民主所作的安排，使所有权力机构各司其职，这能够有效的互相制约。因此，政党和社会公众必须尊重君主仲裁，即使仲裁让败选的政党重返执政台。

马来西亚君主立宪制具有英国威斯特敏特的特点，同时具有马来半岛的政治传统。¹ 马来半岛的9个王室得到保留，并组成了一个“统治者理事会”²，9名统治者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定期选出国家的正副元首，5年为一任，可轮任但不可连任。³ 与不受连任限制的首相制相较而言，国家元首的轮任制度恰好局限了统治者扩张王室权力。而另一方面，国家元首自由的酌量权力可防止民主机构出现滥权情况。

相较于泰国近年民主发展转向诉求改革王室的运动，马来西亚未出现类似的情况。其可能原因包括：一、国民仰赖以君主公正和中立的仲裁角色纠正政党和政治精英引起的政治乱局；二、马来社群依然需要君主对宗教和民族地位进行保护作用。

本文涵盖5个部分。首先，本文将概述马来西亚2018年至2022年间的政局演变，也梳理2020年联邦危机的发生过程及结果。其次，探讨对处理政治危机的君主行事原则，并以霹雳州2009年的宪政危机作为对比分析不同的时空背景以及联邦与州属之间的异同之处。再次，分析联邦危机落幕后的政局发展及结构的变化。第四部分为主要介绍政权结构裂变下的君主作用。最后则是反思危机中的民主窘

¹ 透过最高元首的加冕仪式可见从衣着、配饰到各样的器具都具有各州王室特色，其中象征最高元首权威的世俗权杖（Cogan Alam）和宗教权杖（Cogan Agama）乃是参考英国的皇室传统。

² 统治者理事会源于1895年英国参考印度君主共议政模式后，将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的统治者纳入一个称为Durbar的统治者会议，其后又将马来属邦的五名统治者纳入。马来亚独立后，统治者会议受联邦宪法重新规范并继续沿用至今。

³ 第一轮的顺序是森美兰州严端（1957-1960）、雪兰莪（1960-1960）、玻璃市（1960-1965）、登嘉楼（1965-1970）、吉打（1970-1975）、吉兰丹（1975-1979）、彭亨（1979-1984）、柔佛（1984-1989）、霹雳（1989-1994）。统治者们此后依该顺序接任。没有君主制的砂拉越、沙巴、槟城及马六甲，国家元首委任各州一名元首，可列席统治者理事会。

境及总结, 政治精英已将民主规则视作斗争工具而弱化了基层民主力量。因此, 社会需自立自强民主以抗衡在上位的君主和政治精英。

二、文献综述

本文乃参考马来西亚近年政局研究的文献。2018 年是马来西亚民主化迈入新里程碑的一年, 人民透过选举制度结束了由巫统领导国阵 61 年的政权。据 Muhamad M. N. Nadzri 的分析, 国阵衰败因素包含了反对党势力在马哈迪及其带领的土著团结党的加入后得到强化, 而国阵面临内部尤其是巫统的分裂, 再者是时任首相纳吉的执政问题, 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公民参与性政治的影响力 (Nadzri, 2018)。然而, 新局维持不到两年便引发政权危机。James Chin 对希盟衰落作了分析, 归结于大多数马来人其实未准备好与非马来人分享政治权力 (James Chin, 2020)。无论如何, 马来西亚的“改朝换代”是民主进程重要的里程碑, 如 Dettman 所点评, 新政府采用前朝渐进的改革路径, 甚至允许一些非民主的做法, 都是为了巩固新政。至于在野的国阵, 则趋向强调改革对马来传统利益影响 (Dettman, 2020)。

2020 年政党斗争白热化终使联邦爆发政权危机, 在国家元首主持的首相遴选过程中, 土著团结党主席慕尤丁“脱颖而出”。国阵也在巫统的率领下重新回到执政台上, 象征着非马来人共享政权的希盟新局落幕。

然而, 土著团结党创立了国盟后没能让政局完全稳定。Aznil Tayeb 总结国盟存在的三个挑战是: 一、国盟的联合政体脆弱; 二、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蔓延; 三、希盟及其他的反对派都质疑国盟政权的合法性, 并导致负面的“后门政府”形象 (Aznil Tayeb, 2021)。新首相也以抗疫之名发布国家紧急状态以逃避国会不信任动议。

此外, 关于社会对时局的看法, 可参考 Mohd Irwan Syazli Saidin 的意见调查。其调查主要访问了 114 名研究生, 他们如何看待 2020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1 日权力过渡, 其中有 60.6% 受访者表明拒绝联邦危机期间的权力过渡, 并且对国盟背叛人民委托的批评表示认同; 高达 86% 的受访者认同国家元首发挥了有效作用 (Saidin, 2023)。就此而论, 人民从政治危机中见证了马来西亚君主立宪制正向的作用, 最主要能让朝野政党在国家元首的监督及命令之下和平移交政权。

近年, 笔者阅读了马来西亚君主制相关研究的文献, 包含君主的权力和角色、君主的族裔和身份认同, 以及君主对民主发展的影响。这一些面向存在二元性, 例如君主的身份和权力包含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政治与社会、现代与传统间的观点差异, 而且, 这些二元性是可相融的。

从历史追溯马来西亚君主制的起源，最早有受印度宗教文化影响的半岛西海岸的吉打古国和东海岸的狼牙修古国（吴恒灿，2017）。英国学者 J.M. Gullick 描述早期的马来“王国”（*negeri*）通常由一条大河流域或与一群相邻河流汇流而成，并从沿海内陆到中央分水岭形成一片领地。马来词语“*raja*”专指王侯；王侯或王权为主体的政府应称“*kerajaan*”，一般设有事务大臣、财政大臣、军事统领等重要的官职，乃呈现王权与政府不可分割的关系（Milner, 1982）。在印度君权神授观念的影响下，被统治者畏惧于神性化的国王，必须绝对的服从和效忠君主，包括英国传教士 Thomas Beighton 观察到的百姓接受统治者命令接受的任何宗教（Falarti, 2013）。

进入 19 至 20 世纪初，英国在马来半岛进行帝国权力的扩张，引入了西方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市场，大量的中国和印度劳动者随着经济引力涌入了马来亚，在有了卫生、交通、学校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后，加速一些地方迅速发展成为城镇，英国则逐一从王国统治者手上取得管理权，并将马来半岛划分为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但保留了君主制，而马来精英将苏丹以妥协方式保存王权的做法描述为君主的软弱无力，并潜移默化马来社会。不过，Milner 从英国档案和研究文献中找到一些反驳证据。例如，殖民时期中的霹靂州和雪兰莪州的苏丹曾在赌博农场的争议中成功地坚持总督不拥有推翻他们决定的宪法权力，1957 年宪法制定过程的记录表明了“统治者通常是有效的政治行为者”（Milner, 2011）。

另一方面，大量劳动移民者进入马来亚后形成的多元社群结构，对统治者的身份又产生何种影响？值得研究者回溯和厘清。英国将马来人的宗教和社会习俗交由苏丹管理，以对马来人与移民社群进行分治以前，王室其实具有灵活的民族认同，君主及其臣民的身份认同未被种族概念化；苏丹在血统上不一定是土生马来人，其在文化心理上也没有完全选择马来人形象（Milner, 2011; 2012），而自我分类“马来”是东南亚岛屿国家中相对现代的创新，是从 18 世纪末开始，欧洲关于“种族”的思想传播影响了其他地区对概念的广泛使用（Milner, 2011）。到了后殖民时期，马来民族精英将“马来语”当作促进苏丹国的种族团结的自我分类，苏丹为了抗衡精英并与其竞争“马来人的效忠对象”也开始自我种族化。⁴

二战结束后，马来人对身份认同的想法也出现了变化，逐渐觉得苏丹国不再是马来世界的中心点（Ariffin, 1993, p.52-53），而强调维护马来人利益的巫统被视为可以取代统治者的“马来社会的实质性保护者”（Chandra, 1979, p.64）。

到了现代，普世化的民主政治兴起了改革及废除君主制的思潮，亚洲地区也广泛受到民主政治思想中的平等主义影响，对威权体制产生改革诉求，也包括改

⁴ Cheah Boon Kheng（1988）和 Ariffin Omar（1993）提及马来民族内在平等主义使统治者产生竞争身份的感觉，故后殖民时期出现君主反对精英的“马来人运动”和“统一马来人民”。

革君主制, 泰国便是典型案例之一。马来西亚则因政治精英威权体制, 近年来遭受去威权化的挑战, 但君主制所遭受的冲击较小, 这方面可参考 Fatimah Zainab binti Dzulkifli 与 Nazrul Dadziruddin bin Mohd Zameri 的文章, 他们皆以马来视角观察君主与政府的关系, 以及君主立宪制与社会大众的关系, 以此窥探马来西亚君主制度对社会根深蒂固的存在意义。

总归而言, 联邦宪法有着防止君主和民主步向专政的重要作用。尽管宪法仍存在有关权力边界的模糊地带, 但这并不影响权力间的相互制衡。再者, 统治者有着自身重新定义其角色与社会定位, 以顺应当代对超越种族和宗教界限普世价值的广泛期待, 不再纵容马来沙文主义导致非马来人利益的边缘化 (Hamid & Ismail, 2012),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缓民主化对君主制的冲击。

三、马来西亚 2018 年至 2022 年政局概述

马来西亚政治正朝向去威权化, 同时呈现马来伊斯兰主义对抗转型中崛起的公民意识。面对崛起的公民意识, 第六任首相纳吉于 2010 年推行“一个马来西亚”之转型计划, 以调整多元利益群体的需求。然而, 马来伊斯兰主义者却倍感威胁, 尤其是对首相提出逐渐废除“固打制”的建议表示强烈反对。与此同时, 国阵于 2008 年全国大选遭遇政治海啸后开始走下坡路, “一党独大”的巫统面临党内分化问题。前任领导马哈迪不满纳吉的改革而退党, 时任副首相的慕尤丁则批评巫统官员涉贪而遭到撤职, 其后与马哈迪共同创立土著团结党, 试图取代巫统。2016 年, 马哈迪率领土著团结党加入希盟并于 2018 年全国大选推翻国阵。

(一) 2018 年至 2020 年新政局下的希盟政府困境

2018 年 5 月 9 日, 马来西亚第 14 届全国大选实现了政权替换。希盟赢得国会 222 席⁵中的 104 席, 打败维持 61 年政权的国阵政府。希盟的 104 席中, 公正党与行动党各占 50 席与 42 席, 诚信党和土著团结党各赢 11 席和 13 席。至于国阵则守住了 79 席, 而当中的巫统占了 54 席, 成为国会最大反对党。但不久后的“退党潮”使其减至 37 席。另一由伊斯兰党领导的反对派联盟——和谐阵线 (简称“和

⁵ 222 个选区中有 117 个是马来乡区, 并且包括 52 个长期支持国阵的垦殖民区。

阵”)⁶则由伊斯兰党单独赢得 18 席。国阵败选后仍拥有上议院⁷的 37 席，可对希盟的改革法案产生阻力（许良波，2018 年 6 月 5 日）。

州属方面，国阵仅剩玻璃市州和彭亨州；伊斯兰党在保留吉兰丹州政权之外赢得了登嘉楼州；希盟获得 7 个州政权，但除了槟城和雪兰莪拥有超过半数的州议席，柔佛、森美兰、吉打、霹雳、马六甲皆以微小差距取胜，若有一至两名议员放弃支持希盟即可能导致政权危机。东马方面，本是国阵盟友的砂拉越土著保守联合党（PBB）、砂拉越人民联合党（SUPP）、砂拉越人民党（PRS）及民主进步党在获得继续执政后退出国阵，并以新成立的砂拉越政党联盟（简称 GPS）支持希盟。至于沙巴支持希盟的民兴党获得多数议席而出任首席部长。上述联盟选择不加入希盟，维持东马政治自主。

希盟缺乏行政经验

2018 年大选过后，时任国家元首彭亨苏丹阿都拉御准希盟推举马哈迪⁸为第七任首相，同时也赦免正在服刑的希盟实权领袖安华。

马哈迪拥有 22 年的首相经验，唯希盟缺乏行政经验而经常面对争议，例如教育部长推行未经可行性研究以及过于单一化种族视角的政策而引发争议。

其它包括放弃白礁岛主权的司法审核、总检察长私下对所谓的苏禄苏丹后裔认赔的事件⁹，都是缺乏深思熟虑的决定，而希盟在选前宣布废除高速公路收费站、消费税以及关闭莱纳斯稀土厂等的承诺也面临执行困难。整体而言，改革不彰和争议性政策拉低了人民对希盟的信心，其反映在 10 个月后的民意调查结果（当今大马，2019）。

⁶ 和谐阵线（马来语：Gagasan Sejahtera；简称“和阵”），成立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主张建立一个依靠伊斯兰真理的国家，由伊斯兰党领导，成员党包括国民团结党、伊斯兰阵线、爱国党。

⁷ 马来西亚的国会分为上议院与下议院，下议院的 222 个席位由人民选举产生，上议院的 70 个席位则由国家元首或州议会以委任的方式，每一届议员的任期 3 年，不受下议院解散限制，并可以对下议院通过的法案提出否决。

⁸ 马哈迪曾任第四任首相长达 22 年，在位时间最长，也被誉为“马来西亚发展之父”，但其强硬的作派和种族主义经常引起批评。2018 年，马哈迪与安华结束 20 年的政治恩怨，并率党加入安华的希盟，这方面显示他确实是务实派的政治人物。

⁹ 马来西亚根据 1878 年协议的规定，每年支付 5,300 令吉给苏禄王朝继承者；2013 年，苏禄军入侵拿笃导致马来西亚 10 名警察被杀害，国阵政府停止履行协议。希盟执政后，总检察署直接致函苏禄后裔承认错误，以至苏禄苏丹后裔以该信函向国际仲裁庭指控马来西亚应赔偿 630 亿马币。

马哈迪与安华的交接课题使希盟分化

马哈迪率领土著团结党于 2016 年加入希盟, 并在 2018 年大选前达成“希望联盟共识”(当今大马, 2018)。希盟同意, 若大选胜利, 将由马哈迪担任首相, 两年后交接给安华。然而, 缺乏具体时间和方案的“共识”为双方日后的决裂埋下了“伏笔”。土著团结党之后反感于希盟不断提醒马哈迪与安华交接, 而公正党内部则分为两派, 即“支持马哈迪完成五年任期”和“反对安华担任首相”的流派, 后者更于 2020 年参与反对安华接任首相的“喜来登行动”而引致希盟危机。

巫统与伊斯兰党联合马来伊斯兰势力——以“全民共识”抗衡希盟

由于国阵陷入“一马公司”(1MDB)的弊案, 使马来社会对国阵的信任度下降, 土著团结党的成立让部分的马来选民脱离巫统的保护, 并将选票投给希盟, 这导致了巫统的败选。其后, 巫统面对党内的青壮派提出改革意见(东方网, 2018), 但党主席阿末扎希漠视意见, 选择了与伊斯兰党成立“全民共识”(Muafakat Nasional)¹⁰以强化抗衡希盟的势力。伊斯兰党则一直对土著团结党释放善意, 支持马哈迪完成五年首相任期(东方网, 2019)。

(二) 联邦危机发生过程与结果

2018 年大选前政党间有关“首相交棒”的协商, 引致党派分歧乃至恶化斗争, 最终“支持马哈迪完成五年任期”和“反对安华担任首相”的派系集结于吉隆坡喜来登酒店, 而马哈迪的骤然辞职直接引发了首次的联邦政权危机。

2 月 21 日, 希盟主席理事会召开闭门会议以解决分歧。马哈迪拒绝希盟最高理事会要求确立交接首相的时间表, 因为有了具体的日期, 首相的话语权就不再受到重视, 而且土著团结党对希盟的催逼也感到不满(吴珍妮, 2020)。希盟理事会最后达成共识, 让马哈迪主持 2020 年 11 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之后交棒, 同时也提出“优惠配套”鼓励其提前交棒(余秘叶, 2020)。然而, 仅隔一日(2 月 23 日), 朝野阵营便各别召开闭门会议¹¹。土团党主席慕尤丁、巫统主席阿末扎希、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砂拉越土保党主席阿邦佐哈里、沙巴民兴党主

¹⁰ “全民共识”官方网站 <https://muafakatnasional.org.my/>

¹¹ 土团党在总部开会; 砂拉越的政党联盟、民兴党在丽斯卡尔顿酒店开会; 巫统和伊斯兰党在彭亨的干训营开会。

席沙菲益阿达和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在当日一同入宫觐见最高元首；夜晚的吉隆坡喜来登酒店里，聚集了一群反对安华任相的政党领袖和国会议员，一直传闻会出席的马哈迪则并未现身。翌日，马哈迪即向时任国家元首的彭亨苏丹阿都拉¹²递交辞呈，并对外宣布他不认同“喜来登行动”，安华也对媒体表示马哈迪没有屈服于想要夺权却没有任何改革议程的人士。

国家元首遂以联邦宪法第43（2）（a）条文委任马哈迪为过渡首相直至确立新的接任者为止。¹³同时也接纳马哈迪的建议，取消副首相、部长、副部长与政治秘书的人事任命，仅留过渡首相留守内阁。土著团结党的主席慕尤丁带领该党退出希盟，25位土著团结党国会议员已签署支持马哈迪任相的宣誓函（当今大马，2020）。另一边厢，公正党将带领党员参加“喜来登行动”的阿兹敏开除，其也率领了10名议员退党¹⁴，并以独立议员的身份在国会形成另一股小势力，也使希盟仅剩102席，形同“倒台”（当今大马，2020）。

国家元首最终决定以一对一面谈的方式召见国会议员，以遴选出新首相。从2月25日至26日，国会议员分批入宫觐见最高元首，并回答了三道问题：一、是否仍坚持2018年签署的法定声明立场；二、解散国会或组织新政府；三、支持谁接任首相（余秘叶，2020）。希盟、土著团结党、巫统、伊斯兰党、砂拉越州政党联盟（GPS）以及阿兹敏等在内的政党领袖表示支持马哈迪继续出任首相，唯土著团结党后来转向了慕尤丁，¹⁵希盟转向支持安华任相，¹⁶国阵与伊斯兰党重申支持解散国会的立场。¹⁷但马哈迪在这期间的举动无疑影响了政党和社会的观感。首先，他提出组建一个超越党派的“政府”，而且仅由首相一人决定内阁成员的名单，政党领袖自然无法接受失去推举人选的权利，加上巫统和行动党都互相排斥，该想法未得支持。其次，马哈迪在国家元首尚未确立人选之前，即以过渡首相之

¹² 第16任国家元首彭亨州苏丹的全名为阿布都拉·利亚乌丁·阿慕斯达法·比拉·沙（Al-Sultan Abdullah Ri'ayatuddin Al-Mustafa Billah Shah ibni Almarhum Sultan Haji Ahmad Shah Al-Musta'in Billah）。

¹³ 当时的前总检察长阿班迪以宪法未阐明设立过渡首相提出质疑，认为元首若认为没有人可以掌握议会多数，应该行使斟酌权解散国会。

¹⁴ 11名退出公正党的国会议员包括了阿兹敏（鹅唛国会议员）、祖莱达（安邦国会议员）、赛夫丁阿都拉（英迪拉马哥打国会议员）、巴鲁比安（实兰沟国会议员）、卡玛鲁丁（敦拉萨镇国会议员）、曼梳（高渊国会议员）、拉昔（峇株巴辖国会议员）、山塔拉（昔加末国会议员）、阿里彼祖（砂拉卓国会议员）、威利（婆罗洲高原国会议员）、佐纳丹耶新（兰璠国会议员）。

¹⁵ 马哈表示同意土著团结党转态，该党最高理事礼端表示他们支持党主席慕尤丁出任首相，但该党只有26席，加上阿兹敏派的11席也仅凑足37席。

¹⁶ 2月26日，安华指马哈迪不同意出席希盟最高理事会2月25日的会议，故理事会推举安华为首相人选，而时任行动党秘书长的林冠英也于2月27日发文告指马哈迪于2月25日会面时拒绝继续担任希盟首相，并拒绝保证履行《希望联盟大选宣言》中的承诺，林还指出遴选首相是国家元首的权利与权力，马哈迪宣布特别国会的举动如同挑战国家元首。公正党方面，总秘书赛夫丁宣称安华已掌握超过92席，当中除了92名希盟国会议员，也包括非希盟议员的支持。

¹⁷ 国阵与伊党召开联合记者会以宣布撤回对马哈迪的支持，也表达他们不愿与行动党共组政府的决定。

名召开特别国会, 讨论首相人选, 朝野政党均认为此举越过元首权力, 下议院院长阿里夫百也以开会通知信不符合规定予以否决。¹⁸

2月28日, 最高元首苏丹阿都拉与马来统治者理事会共商, 也召见了朝野政党领袖。由于慕尤丁不排斥巫统和伊斯兰党, 故胜算较高, 获得沙巴和砂拉越表态支持, 国会议席也增至114席, 而终受命为首相。¹⁹希盟即刻重新支持马哈迪, 而后者也撤回支持慕尤丁的法定声明, 并宣称已掌握114名国会议员签署的支持声明(星洲网, 2020年2月29日), 但仍没能促使元首改变决定。

慕尤丁成立国盟政府后, 加入“全民共识”以巩固与国阵和伊斯兰党的合作关系。国盟虽多次强调拥有多数议席, 仍被希盟讥讽为“后门政府”, 遭巫统以“撤回支持”换取更多部长职位, 马哈迪创立祖国斗士党继续对抗国盟。18个月后, 国阵撤回支持慕尤丁, 在国家元首劝告下, 慕尤丁主动辞去首相之职; 元首再一次召见国会议员, 并御准由巫统副主席伊斯迈沙比里接任首相, 出现首次由非巫统主席担任首相的局面, 使巫统主席与首相之间出现较量。

土著团结党退出希盟后, 希盟治下的州属同样面临倒台危机。檳城的民主行动党仍然控制州议会, 雪兰莪州政府在苏丹谕令下继续正常运作, 其他州属受到动摇。柔佛州出现“悬峙议会”(hung assembly), 苏丹召集所有州议员到皇宫表达立场, 之后确认比希盟多出两个议席的国盟成员出任州务大臣。²⁰在马六甲州, 两名土著团结党议员表态支持国阵, 首席部长一职也落到国阵手上。²¹由于希盟于2018年在霹靂州仅以多一席获胜州政权, 政变后, 政权自然落到国盟手上。在吉打州, 原任州务大臣慕克里(土著团结党)则因失去希盟支持, 而将权力移交给占据多数席位的伊斯兰党。²²数月后, 风波延烧到沙巴州。前沙巴首席部长及巫统成员慕沙阿曼提出质疑首席部长沙菲益阿达(民兴党)的合法性, 并告上法庭。沙菲益立即请求沙巴州元首解散州议会, 获准于2020年9月26日举行重新选举, 但仍落败。代表土著团结党的哈芝芝在沙巴地方政党和巫统的支持下成为新任首席部长。

¹⁸ 国会下议院院长阿里夫以国会应在国家元首召见议员的结果出炉以后才作商议, 故不批准马哈迪送交的开会通知, 而国家元首也透过王宫文告认同阿里夫的决定。

¹⁹ 巫统与伊斯兰党联合发表文告, 宣布该两党的国会议员都支持慕尤丁, 国阵也表明支持慕尤丁出任首相, 使其掌握了96席(包括国阵42席, 伊斯兰党18席以及土团党36席)。不过, 土团党最高理事会成员卡迪耶欣却称慕尤丁并未获得最高理事会提名, 因部分成员仍支持马哈迪, 此乃反映国会议员与最高理事会分歧的情形。

²⁰ 柔佛州共有56个州议席, 希盟占28席, 而支持国盟的土著团结党、巫统、国大党、伊党共有28席, 加上两名希盟倒戈议员, 国盟获得足够议席组织政府。

²¹ 马六甲州共有28个州议席, 国阵占13席, 希盟占15席(民主行动党8席、人民公正党3席、国家诚信党和土著团结党各有2席), 土著团结党退出后, 国阵比希盟掌握多两席。

²² 吉打州共有36个州议席, 公正党占7席、团结党6席、诚信党4席、伊党15席、国阵2席。

综上所述，希盟执政困境和内部分裂，以及反对派加强势力，皆为 2020 年联邦危机的间接因素。尽管元首确立慕尤丁为首相而直接导致希盟倒台，但实际上政党斗争才是肇因。元首未必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但也无超出权力范围。另外，安华事实上未能掌握国会多数支持，即使成功接任首相也可能面临倒台结果。

四、政治危机下的君主原则

联邦危机让国内外人士见证马来西亚政党如何完成政权移交，让联邦和州属的危机迅速落幕，而这一切过程顺利乃与君主行使的权力有直接关系，故促使笔者对君主行事原则作出探析。

作为国家元首的统治者或君主，必需将国家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包括写入宪法的各民族权利和权力。国家元首须与统治者理事会共商，并以超然的智慧判断应该御准或驳回政府的建议；由于各州王室存在地域性文化和社会结构特点，影响了统治者的行事风格和处事方式，也包括州属利益优先。

马来半岛君主制度现在已是一个涵盖马来民族团结、伊斯兰教义发展及国家主权统一的重要象征，此也体现马来现代君主的多重身份和角色，而马来西亚联邦宪法对君主权力的安排包含宪法第 153 条之 1 中的维护涉及马来人利益。此外，宪法第 160 条也表明马来人是信奉伊斯兰教、习惯说马来语、符合马来习俗并且在独立日之前在联邦或新加坡出生，或由其中一人在联邦或新加坡出生的父母所生，或在该日居住联邦或新加坡的人士。宪法的规定让人民将君主或统治者归类到“马来统治者”身份，而使其身份受到局限，实际上统治者也正在透过处理政治危机的过程表明其功能并不限于马来人和伊斯兰事务。从国家来说，国家元首对司法、行政和国会拥有拥有最终的和酌量的裁决权力，包括对这些机构的人事任命和决定如赦免囚犯、国会法案，以及颁布紧急条例。²³作为国家三军总司令和伊斯兰教首长，拥有对一切伊斯兰事务的最终裁定权力，全国伊斯兰宗教事务理事会²⁴所作决定都必需得到马来统治者理事会的核准。

²³ 依据联邦宪法第 39 条，联邦行政权归于最高元首；最高元首则依循宪法第 43 条第 2 条款，委任下议院大多数议员推举和信任的议员为首相；联邦宪法第 40 条规定最高元首裁决任何事务前须听取首相或大臣的建议和劝告，不可独断而行。另外，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第 32 条至 38 条规定，地位在所有人之上的最高元首不可面对任何诉讼，而第三十四条列出最高元首受限行使的权力：不得行使州统治者的职权，伊斯兰教首长相关的职权除外；最高元首不得担任受薪的职务、不得从事任何营利活动；除了进行国事访问，最高元首不能在未经过统治者理事会的同意下离开联邦超过 15 日。

²⁴ 全国伊斯兰宗教事务理事会（MKI）的主席之位由苏丹出任。

不过, 基于君主统而不治的原则, 国家需由首相带领的内阁和行政部门运作, 即使首相辞职了, 国家元首也不能接管或暂代职务, 而需依据联邦宪法第 43 条第 2 条款之 A 项安排一名过渡首相, 等候民主机构推荐首相人选。²⁵

笔者将以 2009 年霹雳州撤换大臣的风波作为例子比较分析不同君主在处理危机中的决定差异和原则。Jaclyn LC Neo (2012) 认为联邦与州属的政治结构本质基本相同, 故霹雳州宪政危机将可能是联邦的“彩排”, 故作者认为迫切需要澄清和理解君主立宪制在确保政府民主过渡方面的作用。

2009 年爆发霹雳州宪政危机时, 霹雳州苏丹拒绝了原任州务大臣关于解散议会重新选举的请求, 不但要求大臣率领政府部门总辞, 也仅召见国阵的代表和议员, 其后任命了国阵议员作为新州务大臣, 使败选的国阵得以重返执政。从过程到结果都缺乏民意基础, 导致民主支持者的质疑。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 (SUHAKAM)、政治家东古拉沙里哈姆扎、前上议院议长 Abdul Hamid Pawanteh 乃至学术界人士都对此表达质疑的态度, 民联支持者更在王宫外抗议以及率众在议会大厦前种下“民主之树”。民主认为法院的判决²⁶乃“长期受到精英主义和腐败指控的马来西亚司法机构与君主制共谋”的结果 (Jaclyn LC Neo, 2012)。

至 2020 年, 统治者处理政权危机已有所改进, 明白即使处理方式没有违宪, 也需注意社会观感, 而政府首脑必需获得多数议席支持, 除了可以减低民主质疑, 也可展示王室对民主的尊重。2020 年国家元首的处理方式和过程都符合联邦宪法, 而且是在首相主动辞职后才介入处理。联邦宪法也并无关于政党协议的规定, 国家元首及统治者理事会无须考虑希盟的“共识文件”。因此, 希盟无从挑剔, 唯能责怪国盟“蒙骗君主”(当今大马, 2020)。

尽管国家元首没有解散议会和重新举行选举, 但与国会议员进行一对一会谈已展示对民意基础的尊重。因此, 社会与网路社交媒体自主发起的集会产生的政治效应及对民众的影响皆非常有限,²⁷而且缺乏政党与政治人物高调参与, 无可否认正值新冠肺炎流传期间, 民众心系健康大于鞭策政治, 故反响不大。

²⁵ 联合邦宪法第 43 (2) 条规定, 由赢得国会多数议席的政党推举一名首相, 而且需获得下议院大多数议员的信任, 再由最高元首正式委任之。第 43 (4) 条规定, 当首相不再获得多数议员支持, 必须主动带领内阁辞职或向元首要求解散议会。

²⁶ 霹雳州宪法第 XVI (6) 条阐明, 州务大臣有辞职的义务, 不必需经过信任投票的程序, 故当苏丹认为州务大臣不再获得多数议员支持时, 直接要求其辞去相关职务, 该举动并无违宪。此外, 霹雳州宪法第 18 条 (2) 阐明苏丹具有“自由裁决的权力”选择和委任州务大臣, 而“解散议会”并非苏丹处理州务大臣课题的唯一选项。(Jaclyn LC Neo, 2012)

²⁷ 最高元首宣布慕尤丁为首相之后, 吉隆坡独立广场出现约 50 人的小型集会, 与会者有马哈迪外孙女依妮扎, 高喊“民主已死, 人民自立”等口号; 社交媒体上有网民标记“非我首相”或“NotMyPM”表达对结果的不满; 早前也有网民发起“推文”联署“马来西亚人民反对后门政府”, 至 3 月 1 日突破了 12 万名联署者; “拯救大马示威委员会”号召 SOGO 百货商场举办集会, 前净选盟主席安美嘉等人权活动分子和政治人物均有出席。

由于联邦与州为不同等级，国家元首和州属苏丹的职权不同，所考量的问题和看法自有差异，这正是考验统治者的自由心证，唯其自由也须符合宪法规章，而元首在王宫进行遴选首相的程序，也是展示了君主握有实质权力的一面，并非所谓的“民主机构的橡皮图章”，但同时表明慕尤丁出任新首相并非元首的意志控制，而是经过询问国会议员和政党领袖意见呈现的结果。

不过，遴选首相程序看似符合宪法规章，却让败选的国阵重返内阁。违背选举结果是否等于违反民意？国会议员应以政党优先或民意优先？这是联邦危机衍生的问题，也激发我们重新思辨民主制度的内涵。无可否认，政治人物和民众都面对了 Jaclyn LC Neo 所指“对支持相关宪法规定的公约和原则的理解不足及含糊不清”的问题。

五、危机落幕后“三角鼎立”与联合政府模式

危机落幕后，政权结构整体有碎片化趋势。这反映在国阵与希盟之间的两线制转向了国阵、希盟、国盟三股势力交互的局面，加上沙巴和砂拉越的政党联盟，任何阵营都无法单独执政而须准备接受多数与少数联合的政府模式。

果不其然，2022 年第 15 届全国大选结果，希盟领先国盟 8 席，不过未到国会半数，故元首建议其与作为第二多数的国盟组成多数派政府，但国盟拒绝合作。彼时败选的国阵却成了关键，而巫统主席阿末扎希要求国阵议员统一支持安华（苏俊翔，2022），希盟的支持者在该情势下唯有接受与国阵共享权力。另一边的伊斯兰党终以 43 席取代巫统，成为国会最大党，²⁸与国会第二大党——行动党之间的对立更明显，马来伊斯兰主义者也更加的忌惮希盟。

希盟与国阵以及东马政党组成“团结政府”，注重社会平衡发展之外，也与国盟竞争伊斯兰，包括禁止支持同性恋活动、拟议在学校进行“圣训 40 段”鉴赏单元。针对以巴战争，安华以高调谴责和制裁以色列展示能够代表伊斯兰世界。政党的伊斯兰竞争导致伊斯兰教义被过度解读，也放任清真化侵蚀世俗利益，轻易的将非穆斯林议员的批评贴上煽动宗教和种族的标签。

未来，希盟与国阵将有长久或短暂的合作关系？正如阿末扎希所言，只要由他担任巫统和国阵主席的一天，全体国阵议员必定支持团结政府至下届大选（南洋商报，2023 年），这也意味希盟与国阵的联合模式随时会因党主席换人而出现

²⁸ 伊斯兰党透过先后加入希盟和国盟，将其势力从东海岸向西海岸扩张，其擅以网路社交媒介向青年宣讲教义及宣扬政治理念乃是重要的成功因素。2020 年改变之后，伊斯兰党加入国盟。虽然土著团结党如今依然领导国盟，但伊斯兰党已几乎可取代土著团结党的领导地位。

变化。若下届大选仍然呈现“悬峙国会”，不无可能再促使希盟与国阵共组政府，不过也须考虑国盟的“战绩”。若仍是希盟获胜，阿末扎希强制全党和国阵支持安华并无可厚非，但反之的情况下，很难说服巫统和国阵基层干部和支持者继续接受希盟，尤其是忌惮行动党的支持者。

无论如何，巫统都将是希盟和国盟竞争当中的获益者。巫统从几场补选获胜，提高不少信心，伊斯兰党则在土著团结党与巫统的竞争中成为国盟的重要支撑。再者，伊斯兰党与巫统先有建立“全民共识”基础，不排除未来想靠在一起的可能性。

因此之故，安华邀请伊斯兰党入阁（星洲网，2023），以此减少依赖巫统争取马来伊斯兰以及削弱国盟势力，尽管邀请伊斯兰党会让行动党和诚信党的支持者失落。除此之外，国阵和希盟各别的支持者仍感到别扭，尤其是华裔选民必须硬着头皮接受行动党与马华公会合作。希盟依靠行动党守住华裔选票，但另一方面的巫统支持者抗拒行动党的平等主义。不过，立场不定的中间选民倒是可以接受政府联合模式，唯不适于国阵腐败官员形象还未去除，却能继续执政，让希盟反贪腐的形象受损。

总而言之，各个政治联盟之间并不是恒定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政党之间可弹性合作，因此，国阵与希盟会维持良好紧密伙伴的关系至国会解散，也可能延续合作对垒国盟的全国大选，但也不可否认大选的最终成绩才是政党联盟之间继续合作或转向竞争的决定因素。

六、君主制作用：维护统一、遏止极端、制衡权力

国家元首彭亨苏丹阿都拉（2019-2024）监督政党间和平移交政权以及合作组成联合政府，令国民对国家元首的期望也逐渐超越了政治人物，现任最高元首柔佛苏丹依布拉欣绝不做傀儡元首和放任国家腐败分子的声明也得到国民认同。马来西亚政治出现去威权化转型以来，中央政权明显趋向弱化，加上政党竞争而致派系分裂导致的碎片化政权结构，难以避免政党领袖趁机建立个人独裁政体。于此，君主权威正好被赖以维护国家的统一性、遏止民族和宗教极端主义扩张，以及制衡民主机构。简言之，君主可发挥引导政治正向发展的效用。

（一）维护国家的统一性

马来西亚由北婆罗洲（东马）和马来半岛（西马）组成。马来半岛由九个马来王国让渡权力所组的“马来亚”，1957年脱离英国殖民而独立；1963年，新加坡、北婆罗洲的沙巴和砂拉越与马来亚共同组成“马来西亚”（新加坡于1965年退出）。国家宪法确立君主是国家统一的象征，²⁹马来统治者的“统”，乃涵盖领土统一，九名州统治者让渡权力乃促成马来半岛统一，也意味着九名统治者联合才能等于一个完整的国家形式，而任何州属政府不能单方面宣布退出马来西亚。³⁰不存在统治者的州属由统治者理事会推举的国家元首委任州统治者，以保持国家形式完整。

当前的政权结构裂变并不至于分裂国家，但不可忽视团结政府和国盟透过所控制的州属展现政策和政治形态的差异。双边博弈使政策异化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国盟在其州属推行的清真化包括关闭娱乐场所、禁止经营博彩业和售卖酒精等，无疑凸显马来西亚存在穆斯林州属与非穆斯林州属，并且分化而破坏国会社会完整性。

再者是不可忽视少数分离势力在政治分化下有了活跃的机会。虽然西马也存在分离主义，但东马的分离势力更备受关注。马来西亚成立后，联邦政府修宪削弱东马地位，并忽视其发展，以致沙巴和砂拉越兴起争取主权的风气（陈泓缜2015；谢诗坚，2023；当今大马，2017）。如今的西马政权结构弱化使东马政党成为关键的势力，沙巴和砂拉越的平等诉求也较受到西马重视。

另外，柔佛州苏丹易卜拉欣于2015年提出“柔佛民族”的概念，虽不能与分离划上等号，但确实引导地方社会对自主性的思考，包括了苏丹以《柔佛宪法》强调该州的特殊地位，³¹并以“柔佛脱离联合邦”鞭策联邦政府重视该州发展对地方主权思考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如今苏丹易卜拉欣已出任国家元首，身份与角色的转换促其维护完整的国家形式，否则应受到统治者理事会检讨。³²

（二）遏止民族和宗教极端主义扩张

马来西亚默迪卡民调中心于2018年发布《马、菲、印、泰宗教极端主义调查》，显示马来西亚穆斯林对极端主义团体的支持和同情程度上升。如今在政党竞

²⁹ 以柬埔寨为例，宪法确立“国王是终身的国家元首，是全国团结的象征，也是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保证”；泰国国王担任国家元首、武装部队统帅，也是佛教的拥护者。

³⁰ 新加坡受迫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乃因马来精英确保马来人主导国家。

³¹ 柔佛从1914年加入马来属邦、1957年加入马来亚，都以独立王国地位签署相关协议，柔佛王室的御林军也获准不必编入国军。

³² 例如2019年出任第15任最高元首吉兰丹苏丹莫哈末五世因个人行为违反王室传统，受到检讨并退位。

争伊斯兰话语权之下, 政客不惜利用族群之间的矛盾捞取“政治红利”, 包括了“非马来人政权威胁马来人”的言论, 不知觉中将宗教推向民族主义 (Religious Nationalism)。马来伊斯兰的支持者排斥非马来政权的同时, 非马来人也忧惧伊斯兰民族主义对多元性的破坏, 所幸的是统治者理事会始终对伊斯兰事务拥有最终解释权。Antohny Milner (2011) 指出, 历史上的马来西亚君主制并非本质上的“马来”机构, “马来”是殖民时期和非殖民化过程用以强调的自我分类, 而联邦宪法所诠释的“君主”或“统治者”乃具有“种族中立”之意; Milner 由此反思现代残留的君主“跨种族的物质”作为“社会粘合剂”的可能性。作为“上苍代理人”, 统治者对穆斯林有领导作用, 其近年来对玩弄种族课题和政治化宗教的政客都给予严厉批评 (当今大马, 2008; 星洲网, 2023)。霹雳州拉贾·纳兹林·沙阿 (Raja Nazrin Shah) 批评穆斯林对琐碎事情给予过分重视, 雪兰莪州苏丹沙拉夫丁谴责擅自禁止穆斯林参加瑜伽活动的宗教司。统治者们的批评乃反映王室兼顾世俗利益的态度。因此, 非穆斯林和非马来人可以透过统治者对伊斯兰事务的终极权力保护利益。与此同时, 统治者们也不允许非穆斯林插手伊斯兰相关事务。

(三) 制衡民主权力机构

当统治者意识到巫统已非王室唯一依靠时, 便以制衡行政权力重新夺回一些“失地” (Hamid & Ismail, 2012)。如 Hamid & Ismail (2012) 所指, 部分的统治者除了与贵族精英继续维持紧密关系, 也跟现代民主互动, 并不再纵容马来沙文主义边缘化非马来人, 以及重视子民对超越种族和宗教界限的普世价值的广泛期待。不过须注意, 统治者所认可的民主乃是不逾越王室权力与权利, 从国家角度看, 它具有阻止政治精英利用民主扩张权力或实现独裁的意图。

七、反思危机中的民主窘境

尽管政治危机在君主果断裁决之下迅速落幕, 国家和政府恢复运作, 然无可避免地使民主陷入窘境。如上所述, 国会议员在王宫进行遴选首相程序虽不违反宪法, 却让败选的国阵重返内阁, 纠结于违背选举结果是否等于违反民意、国会议员应以政党优先或民意优先, 使民主支持者必须重新思辨民主的内涵。

事实上, 联邦危机衍生合法性问题, 不仅是党意和民意的冲突, 更在于新首相的委任脱离正常程序, 竞争者只须去皇宫接受认同和祝福而无须经过议会核确实多数支持真实性。

2022 年大选结果使国阵内部出现支持希盟或国盟的分歧，也使国盟主席慕尤丁始终相信其获得多数议席从而质疑安华受御准出任首相的公平性和合法性。³³ 竞争者是否愿意公布签署声明的议员名字，或主动以信任动议证实其拥有多数支持，都不在国家元首控制之下，即使元首曾建议新首相通过国会证实其获得多数支持。不过，值得一提是，安华出任首相后以信任动议证实其合法性并巩固了团结政府（范晓琪，2022；谢治婷，2022）。尽管如此，民主规则依然沦为政治人物争权的工具，人民一直“坐在观众席上”目睹一切过程而无能为力。

支持改革的基层力量与民主派政党从 1998 年的“烈火莫熄”开始共同推动民主，2018 年实现权力更替后，民主党派依然沿用政治风险较小的“威权创新”，而民意代表需依靠政党资源竞争国会议席，多数时候选择服从政党大于顺从民意。鉴于此，基层力量不能完全依赖上层权力互相制衡，即过度依赖君主制衡精英也会使权力的天平倒向君主，而过度依赖精英则仅呈现精英民主，故此，基层必需加强公民自主，摆脱受精英民主操纵。简言之，强化基层公民意识发展民主力量，方能有效抗衡政治精英。

八、总结

本文以政治危机说明马来西亚君主的角色和作用，凸显君主制在政治转型过程的重要性。2018 年至 2022 年间的政党领袖斗争导致四年内更换了三任首相，并形成国阵、希盟和国盟交互抗衡的政权结构，不过始终没有酿成政治暴力事件，社会也没有混乱局面，因各政党遵循君主谕令完成和平移交政权。不过，民主规则沦为了精英争权夺利的工具，也导致政治化宗教而威胁了多元社会的发展。

然而，在精英争权夺利而影响民心的同时，国家元首和统治者们透过政治危机强化角色作用，彭亨苏丹阿都拉透过 2020 年联邦危机和 2022 年大选后出现的“悬峙国会”展现了君主超越政治和尊重民主的立场，突显君主不是“国会的橡皮图章”，而国民也仰赖君主作为国家的“定海神针”。

君主实际上也扮演着外交和平的角色，帮助国家提升合作伙伴关系及安全。苏丹阿都拉在国家元首任期内对阿布扎比进行五次国事访问，促成了双边国家石油公司合作，也在访问新加坡期间主动要求参观新加坡的新生水展览馆，坐上军机俯瞰新马的海岸线，以化解两国关于水源供应和白礁岛主权的争议。马中关系方面，统治者们向来强调对中国的认同，无可否认对社会的对华态度有促进作用。

³³ 慕尤丁认为其已拥有多数议席却未获最高元首召见，得不到王宫的公正对待；其言论后来受到彭亨王室的法律控告。

至于希盟和国阵的合作模式能走多久, 将取决于下届大选结果, 两个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影响合作是不争事实, 这包括了巫统与行动党的意识对立, 以及行动党与马华公会之间的矛盾。除此之外, 不可忽视马来伊斯兰仍然是政治核心, 也是各阵营竞相争取的对象,³⁴故非穆斯林与非马来人依然处于受政治化伊斯兰威胁的情境威, 也迫使他们需另寻求保护力量, 因此, 超越政党政治的君主顺理成章成为非马来群体的庇护者。另一方面, 统治者正在透过对公共事务作出决定性干预以展现实质权力。2006 年, 雪兰莪苏丹要求参与一些金融活动而违规的州议员辞职; 2007 年, 统治者理事会拒绝了时任首相阿都拉提名的高级司法职位候选人; 2009 年后, 人民联盟(民联)执政的霹雳州和雪兰莪州先后爆发撤换州务大臣的风波, 苏丹们也透过裁决改变政局(Hamid & Ismail, 2012)。

由于国家元首乃采轮任制, 相较于政治精英, 君主不容易扩大权力而演变成专政体制。实际上, 统治者必需听取政府首脑的建议; 各州统治者的谕令需经过政府颁布行政指令及下达地方议会执行才会生效。

除此之外, 统治者愿意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转型社会, 如霹雳州苏丹纳兹林沙所表明的, 只要劝告和意见的权利、给予鼓励和激励的权利、提醒劝诫的权利都得到保存, 王室权力无须扩展(东方 Online, 2021)。加上马来社会依赖统治者捍卫民族和宗教特权, 以及非马来人认同君主的保护作用, 故未出现民主明显挑战王室的现象。

然而, 民主须慎防过度仰赖君主的“定海神针”而引起权力天平向王权倾斜的后果, 既然如此, 社会需自主发展民主和巩固基层民主, 以抗衡在上的统治阶层, 包括君主和政治精英。

参考文献

- 陈泓缣(2015年10月5日)。从沙巴经验看砂拉越自主运动。*Malaysiakini*。
<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14536>
- 陈慧璋(2020, 12月29日)。马国全民共识联盟名存实亡。*联合早报*。
<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world/story20201229-1112222>
- 陈中和(2009)。君主立宪制在马来西亚的发展——马哈迪政府时代的宪政改革对统治者地位的影响。*南方学院学报*, 5, 59-90。
- 当今大马(2008年12月2日)。雪苏丹指大马不是马来人专属, 非议政客爱炒作琐碎种族课题。*Malaysiakini*。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94174>
- 当今大马(2010年4月16日)。从霹雳大臣双胞胎案谈大马宪政危机。*Malaysiakini*。
<https://www.malaysiakini.com/letters/129393>

³⁴ 虽然马来政党间有意识和利益矛盾, 但总能团结于维护马来人共同体之下, 常见于“马来人团结大会”号召朝野马来政党, 反观华人政治的团结运动除了1980年代在马哈迪政权打压下被激发以外, 一般情况不易促成朝野华基政党团结。

- 当今大马 (2017 年 12 月 5 日)。斥 S4S 口号煽动, 扎希要重罚东马分离主义。Malaysiakini。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04469>
- 当今大马 (2018 年 1 月 7 日)。希望联盟共识。Malaysiakini。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07862#google_vignette
- 当今大马 (2019 年 7 月 24 日)。希盟民意跌穿五成门槛, 政府 39%首相 46%。Malaysiakini。
https://m.malaysiakini.com/news/473839#google_vignette
- 当今大马 (2020 年 2 月 24 日)。团结党退出希盟, 议员签 SD 支持马哈迪任相。Malaysiakini。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12028>
- 当今大马 (2020 年 2 月 24 日)。希盟政府原则上倒台, 政权战谁会占上风。Malaysiakini。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12045>
- 当今大马 (2020 年 3 月 1 日)。指控慕尤丁欺骗元首, 佐哈里放话将报警促查。Malaysiakini。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12775>
- 东方网 (2018 年 6 月 20 日)。凯里竞选宣言废攻高职限制。马来西亚东方日报。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18/06/20/248032>
- 东方网 (2019 年 7 月 30 日)。支持敦马做满一届哈迪: 首相不是鞋。马来西亚东方日报。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19/07/30/300349>
- 东方网 (2020 年 11 月 21 日)。消息: 除了阿末扎希 29 国阵议员支持慕尤丁任相。马来西亚东方日报。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22/11/21/528062>
- 范晓琪 (2022 年 11 月 24 日)。安华: 12 月 19 日召开国会第一件事提呈信任动议。联合早报。
<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world/story20221124-1336720>
- 黄国强 (2023 年 9 月 4 日)。敦马: 非马来政党为外来政党, 拒绝融入马来人文化。马来西亚东方日报。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23/09/04/594016>
- 黎翰辉 (2023 年 10 月 16 日)。回应首相邀伊党加入团结政府伊党署理主席: 不会加入。马来西亚东方日报。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23/10/16/604019>
- 刘勇 (2023)。权力体系变迁视角下马来西亚政治转型困境研。南亚东南亚研, 5, 75-87。
- 苏俊翔 (2022 年 11 月 21 日)。阿末扎希: 国阵 30 名议员中 26 人支持国阵决定。联合早报。
<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world/story20221121-1335459>
- 孙玉刚 (1997)。当代泰国国王的政治作用及其形成原因浅析。东南亚纵横, 1, 46-49。
- 吴恒灿 (2017 年 1 月 2 日)。吉打古国和狼牙修古国。南洋商报副刊。
<https://www.enanyang.my/%E5%89%AF%E5%88%8A/%E5%90%89%E6%89%93%E5%8F%A4%E5%9B%AF%E5%92%8C%E7%8B%BC%E7%89%99%E4%BF%AE%E5%8F%A4%E5%9B%BD>
- 吴珍妮 (2020 年 2 月 22 日)。*‘保马派’会议促勿逼交棒, 扬言或发生‘不想出现之事’*。星洲网。
<https://www.sinchew.com.my/?p=3021207>
- 谢诗坚 (2023 年 1 月 8 日)。东马地位终被平反。南洋商报。
<https://www.enanyang.my/%E7%81%BC%E8%A7%81/%E3%80%90%E7%81%BC%E8%A7%81%E3%80%91%E4%B8%9C%E9%A9%AC%E6%94%BF%E6%B2%BB%E5%9C%B0%E4%BD%8D%E7%BB%88%E8%A2%AB%E5%B9%B3%E5%8F%8D%E8%B0%A2%E8%AF%97%E5%9D%9A%E5%8D%9A%E5%A3%AB>
- 谢晓娟 (无日期)。东南亚国家从威权到民主的政治转型及其制约因素。亚洲问题研究论丛, 76-83。
- 谢治婷 (2022 年 12 月 19 日)。安华感谢国会通过首相信任动议。马来西亚东方日报。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22/12/19/534792>
- 星洲网 (2020 年 2 月 29 日)。马哈迪公布名单, 114 支持者名字。星洲日报。
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2225864.html
- 星洲网 (2023 年 10 月 12 日)。安华: 已发出邀请函, 邀伊党加入团结政府。星洲日报。
<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31012/nation/5051214>
- 星洲网 (2023 年 12 月 10 日)。雪苏丹: 不能对社会契约无知 大马没有外来者。星洲日报。
<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31210/nation/5186642%2031>
- 许良波 (2018 年 6 月 5 日)。国阵上议员过半希盟新政或难过关。马来西亚东方日报。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18/06/05/245998>
- 余秘叶 (2020 年 2 月 21 日)。蓝眼火箭诚信达共识‘交棒配套’3 选择。星洲网。
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2220954.html

- 余秘叶 (2020年2月25日)。元首问3道问题, 召222国会议员。星洲网。
- 周方治 (2012)。泰国立宪君主政治权威兴衰的过程、原因与趋势。《南洋问题研究》, 2, 29-36。
- 庄礼伟 (2011)。多元竞争环境下的马来西亚政治生态。《东南亚研究》, 2, 12-18。
- e 南洋 (2023年4月23日)。扎希: 30国阵议员挺安华, 支持团结政府至来接届大选。《南洋商报》。
<https://www.enanyang.my/%E6%94%BF%E6%B2%BB/%E6%89%8E%E5%B8%8C30%E5%9B%BD%E9%98%B5%E8%AE%AE%E5%91%98%E6%8C%BA%E5%AE%89%E5%8D%8E-%E6%94%AF%E6%8C%81%E5%9B%A2%E7%BB%93%E6%94%BF%E5%BA%9C%E8%87%B3%E6%9D%A5%E5%B1%8A%E5%A4%A7%E9%80%89>
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2223135.html
- Chin, J. (2020). Malaysia: The 2020 Putsch for Malay Islam Supremacy. *The Round Table* 2020, 109(3), 288–297.
- Dettman, S. (2020). Authoritarian Innovations and Democratic Reform in the “New Malaysia”. *Democratization*, 27(6), 1037-1052.
- Dzulkifli, F. Z. b., & Mohd Zameri, N. D. b. (2010). The Functions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in Malaysian Political System: The Perceptions of Malay Community. In *Political Managements and Policies in Malaysia, Seminar on National Resilience* (pp.353-369). UUM.
- Harding, A., & Kumarasingham, H. (2022). The Malay Monarchies in Constitutional and Social Conception. *As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9(3), 399-417.
- Hamid, A. F. A., & Ismail, M. T. (2012). The monarchy and party politics in Malaysia in the era of Abdullah Ahmad Badawi (2003-09): The resurgence of the role of protector. *Asian Survey*, 52(5), 900-923.
- Hamid, A. F. A., & Ismail, M. T. (2013). The Monarchy in Malaysia: Struggling for Legitimacy. *Kyoto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 Issue*, 13.
- Hutchinson, F. E., & Nair, V. P. (2016). *The Johor Sultanate: Rise or Reemergence?* ISEAS.
- Hwang, I. W. (2002). Authoritarianism and UMNO's factional conflict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2(2), 206-230.
- Jong, P. E. de J. de. (1975). The dynastic myth of Negeri Sembilan (Malaya).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en Volkenkunde*, 131, 277-308.
- J. M. Gullick (1965). *Indigenous Political Systems of Western Malaya*. University of London.
- Kheng, C. B. (1988). The Erosion of Ideological Hegemony and Royal Power and the Rise of Postwar Malay Nationalism, 1945–46.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1), 1–26.
- Maziar Mozaffari Falarti (2013). *Malay Kingship in Kedah: Religion, Trade, and Society Kedah: The foundations and durability of Malay kingship*. SIRD.
- Milner, A. (2011). *Malaysian Monarchy and the Bonding of the Nation*. 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 Milner, A. (2012). "Identity Monarchy": Interrogating Heritage for a Divided Malaysia.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 3-212.
- Nadzri, M. M. N. (2018). The 14th General Election, The Fall of Barisan Nasion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1957–2018,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37(3), 139–171.
- Neo, J. L. C. (2012). Change and continuity: the constitutional head of State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s in Malaysia, *Malayan Law Journal*.
- Omar, A. (2015). *Bangsa Melayu: Malay Concepts of Democracy and Community, 1945-1950*.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 Pascoe, D. (2016). What the rejection of Anwar Ibrahim's petition for pardon tells us about Malaysia's Royal Pardon System. *Asian-Pacific Law & Policy Journal*, 18(1), 63-92.
- Saidin, M. I. S. (2023). Malaysia's crisi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Understanding the 2020 Power transition and 'Sheraton Move' polemics through the 'eyes' of Malaysian political science graduates, *Cogent Social Sciences*, 9(1).
- Tayeb, A. (2021). Malaysia in 2020 Fragile Coalition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Regression. *Asian Survey*, February 2021, 61(1), 99-105.
- Weiss, M. L. (2020). The limits of “Populism”: How Malaysia misses the mark and why that matters.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39(2), 207–226.